

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與心理調適 及自我調節之關聯*

張仁和**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林宣旭

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黃金蘭

臺灣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科

林以正

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本研究以四個研究檢驗自我形象目標與關愛目標量表之特性。自我形象目標係指個體聚焦於自我形象的追求，關愛目標則從自我價值的追求轉入關懷他人的需求，進而促進對他人的福祉 (Crocker & Canevello, 2008, 2012)。以往研究顯示兩種人際目標對於心理適應與人際關係均有預測力，但並未應用至華人社群。據此，本研究先以三個獨立樣本 (研究 1A 至研究 1B)，分別檢驗量表的信效度分析。在研究 1A 以 207 名參與者進行中文版量表的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穩定的雙因素結構，且關愛目標能正向預測多項心理適應指標，自我形象目標則為負向預測或無預測力。研究 1B 再以 54 名參與者進行兩週後再測，顯示穩定的再測信度。然後，研究 1C 再以 82 名參與者探討人際目標和自我構念之區辨，結果顯示在控制自我構念後，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亦能預測心理適應相關指標。最後，研究 2 以 76 名參與者進行回憶挫折事件的操弄，再探討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與自我調節之關聯，發現關愛目標能有效預測建設性自我批評，自我形象目標則預測情緒性自我批評。結論針對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的研究與應用進行討論。

關鍵字：人際目標、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自我形象目標、關愛目標。

壹、緒論

追求自我價值的彰顯？還是放下自我，進而關懷他人？在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取捨，實為人際互動中常常面臨的兩難，也是「自我—他人」(self and other) 相關研究極欲了解的議題 (Chen, Boucher, & Tapias, 2006; Leonardelli, Pickett, & Brewer, 2010; Rusbult & Van Lange, 2003)。Crocker 與 Park (2004) 回顧追求自我價值 (self-worth) 與自尊 (self

* 在林以正博士指導下完成，本研究科技部經費補助 (NSC101-2420-H-002-022-DR) 部分內容改寫自國立臺灣大學張仁和博士論文與林宣旭碩士論文。

** 通訊作者：張仁和，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E-mail: jenhoc@gate.sinica.edu.tw

esteem) 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愈是追求自尊與自我價值的個體，不僅愈得不償失地追求不到；長期下來，更會讓個體形成「自我價值條件化」(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即是個體在評估自身之價值時，會以是否能滿足某些外在條件為參考標準，例如個人成就、學業表現、外貌吸引力等，而此自我價值條件化則直接負面影響個體之生理、心理與人際關係各層面的品質 (Crocker & Wolfe, 2001)。在學習與自我調節方面，當個體以追求自我價值為主要目的，他們愈會以最後的結果之成功與否來定義自我價值，但卻不在乎成功的原因；不僅如此，由於重視外在表現的動機，更會使個體運用各種策略來避免失敗，即使這些策略可能對學習沒有幫助甚至是有害的，像是自我設限與外歸因 (Dweck, 1986; Molden & Dweck, 2006)。

在實際的場域研究中，Crocker 與 Luhtanen (2003) 蒐集大學部學生的學業領域自我價值條件化，並追蹤一整個學期，結果發現自我價值條件化不僅會使個體有不穩定的自尊、有較高的憂鬱傾向；並且會報告更多在學業領域的困擾，像是跟教授與助教有衝突、休息時間不足、甚至對科目有反感等。整體而言，追求自尊反而讓個體無法從失敗經驗中學習與成長，並且有更多潛在的心理風險。除此之外，追求自尊的個體，由於聚焦在自我身上，更容易在人際關係中忽略他人的感受和需求，而且一心只想要優於他人，因此對會威脅到自我價值的負向回饋，產生逃避、忽略、生氣、甚至攻擊等防衛反應。這些防衛反應更會造成個體與他人之間的敵意和疏離感，進而影響其關係品質 (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 Crocker, Brook, Niiya, & Villacorta, 2006)。

一、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

然而，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人不藉由追求自我價值，但又能在心理健康與人際關係層面均得以成長呢？Crocker 與 Park (2004) 提出轉移目標 (shifting goals) 的想法，他們認為個體可以把追求自我價值的目標，轉移成對自己與他人都有益的目標。據此，Crocker 與 Canevello (2008; 2012) 提出兩種人際目標，自我形象目標 (self-image goal) 與關愛目標 (compassionate goal)，分別對應自我系統動機 (egosystem motivation) 及生態系統動機 (ecosystem motivation)，以探討不同的人際目標與心理適應之關聯。所謂自我系統動機即是個體聚焦於自身，也就是其行為目的均是以自我利益和存亡為主；相對的，生態系統動機則聚焦於外在環境，係以他者之利益與存亡為主。而自我形象與關愛目標則是由此應用於自我和他人的人際範疇中，係為自我系統和生態系統動機之一部分。

關於自我形象目標，係個體想要建構或維持理想的形象，以使自己能夠有所獲益。秉持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不僅是被動地等待別人的讚賞，他們更會主動地塑造外在自我形

象，同時避免別人看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例如當個體想讓別人認為自己是聰明的，就會做一些讓自己看起來很聰明的行為，像是常在課堂上發問、批判他人的想法等。然而，他們也會避免做一些可能會被認為不聰明的行為，例如當不確定自己答案是否正確時就不會舉手回答，或是避免讓他人知道自己有多努力。反之，與自我形象目標關注焦點不同的另一種目標：關愛目標，強調個體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出自於關心他人的福祉，而非源於希望自己能獲得利益或回報 (Crocker, 2008; Crocker & Canevello, 2012)。當個體以關愛目標為出發點時，由於其焦點是擴展於外的，故更會看見整體情況而非局部狀態，進而形成互相影響同為一體之感，也就是生態系統動機的情況。此時個體會發現自己亦是大群體中的一部分，如同自然環境中的生態系統。在此系統中，每個人都會互相影響，猶如牽一髮則動全身。另一方面，由於關愛目標之焦點不在自身形象，而在他人之利益，所以在遇到挫折時，便不會以自身成敗為主，而是能放低自我（因焦點不在自身）從中學習，進而有自我進步的情形 (Crocker, 2008)。而且，基於關愛目標所引發自我與他人乃互相影響、同為一體的感受，個體會想要提升及改進自己，好讓自己有更多能力幫助他人，形成自我進步同時利他的正面循環 (Canevello & Crocker, 2010)。

然而，這樣的觀念有可能與文化心理學中的相依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 和獨立自我 (independent self) 有所混淆 (Markus & Kitayama, 1991)。所謂相依自我為個體將自我概念擴大至周圍親近的個體，如家庭或社群團體，係自我與重要他人融合；而獨立自我為個體將自我與他人區隔，尋求個人的獨特性。這與在人際目標所區分出來的關愛目標和自我形象目標並不相同。關愛目標出於關懷他人，而自我形象目標則出於形塑自我正面形象的動機，關愛他人的前提並不需要擴張自我與他人的界線；反過來說，藉由期望與他人融合的相依自我，也未必出於關懷別人的動機，反而個體可能更加在意他人的眼光，而試圖營造出美好的自我形象。同樣地，建構自我形象也與獨立自我有所不同，獨立自我強調跟他人的區隔和獨特性，因此可能比較不會注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且不會以他人的期待作為自己行動的目的。整體而言，文化心理學強調的獨立自我與相依自我，係從自我的層次予以切入，旨於探討個體如何建構自我概念的心理表徵，即是在形塑自我概念時，個體如何思考自我概念所應涵蓋的訊息內容。然而，人際目標從動機的層次切入，則與自我層次有所不同。所謂動機層次，即是個體主動想去執行和達成某些行為，而不僅是被動的思考自我概念的內涵，而是有更多行為和目的的展現 (Bargh, Gollwitzer, & Oettingen, 2010)。

然而，相依自我與獨立自我，雖然在理論層次可區分出差異性，但兩者還是有重疊之處，即相依自我與關愛目標均是焦點朝向他人 (other orientation)，而獨立自我與自我形象目標則是焦點朝向自己 (self orientation)，是以在測量層次上，彼此仍有可能的關聯性。

在實徵研究上，近期 Niiya、Crocker 與 Mischkowski (2013) 也比較獨立自我、相依自我與人際目標的差別，結果顯示在美國與日本的樣本中，相依自我和關愛目標僅呈現低度正相關 ($r = .14 \sim .32, p < .10$)；此外，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對於心理適應的預測力，也不受獨立自我與相依自我的影響，顯示人際目標對於心理健康的獨特效果。有鑑於可能的誤解和混用，因此作者們認為在本研究中有區辨這些概念之必要性。

二、人際目標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Crocker 與 Canevello (2008) 編製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 (compassionate and self-image goals scale)，做為測量自我形象與關愛目標的工具。她們發現不同的人際目標，對於人我關係信念有不一樣的效果。首先，自我形象目標與零和信念 (zero-sum) 及公我意識 (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呈顯著正相關。所謂零和信念是指對於成敗有非此即彼的想法，意即當他人獲得成功時，個體會認為自己是失敗的；反之，當他人表現失敗時，個體反而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公我意識即是個體在意外在對自身之看法，聚焦在呈現於外在他人可以看見的部分，而非於內在他人不可見的部分。因此，該結果顯示出，採取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由於在意他人對自己之評價，而且自己對他人的評價亦是一種零和對立的觀點，即是以一種自我系統觀點 (egosystem perspective) 來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關愛目標與跟他人的一體性和連結感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更認為自己與他人是有關連而非獨立的，即採取關愛目標的個體以一種生態系統觀點 (ecosystem perspective) 來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人與人的福祉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響的。由於持有關愛目標的個體視自己與他人之間有較強的連結，研究發現關愛目標與零和信念為負相關；此外，關愛目標與公我意識無相關，表示個體並不會特別知覺到社會比較的壓力。

Crocker 與其同事的後續研究，也針對不同人際目標對心理健康跟人際關係的影響進行探討。他們主要是以剛入學的大一新生為受試者，在第一學期連續十週填寫上一週自己在對室友所採取的人際目標，與個人的心理健康跟情緒狀態。結果發現：長期持有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感受到較多的困惑與壓力，且對於室友有較高的敵意跟衝突。相對的，長期持有較高關愛目標的個體，報告較多他人導向 (other orientation) 的正向情緒，例如合作的、平和的、同理的等，並且知覺到較多的社會支持與較好的心理健康 (Canevello & Crocker, 2010; Crocker, Canevello, Breines, & Flynn, 2010; Moeller, Crocker, & Bushman, 2009)。有趣的是，關愛目標能促進良好心理健康的機制來自於個體能夠有效藉由「給予」他人社會支持，來降低壓力與焦慮；然而，若個體採取自我形象目標時，則因減少給予他人的社會支持而使焦慮與憂鬱增加 (Crocker, et al., 2010)。此結果即呼應 Dunn、Aknin

與 Norton 的 (2008) 研究，他們隨機讓參與者進入兩種情境，一種是給予受試者一筆錢，但要求這筆金額要用在別人身上；另一組則是在受試者自己身上。結果發現將金錢用到他人情境裡的受試者，比起用在自己身上的受試者，其事後回報的幸福感受較高，真切呼應「施比受、更有福」的生活智慧。

此外，為避免該結果是受到潛在因素的趨近 (approach) 和迴避 (avoidance) 之混淆，也就是關愛目標之效果可能出於偏向照顧他人的趨近動機，而自我形象目標則是由於偏向保護自身的迴避動機所造成。據此，Crocker 等人 (2010) 交叉分析自我形象趨近與迴避目標，還有關愛趨近與迴避目標，進而形成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各自搭配趨近迴避動機共四個分量表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無論是自我形象的趨近或迴避目標，對於心理健康的預測都是一致的；同樣的，區分成關愛的趨近或迴避目標也是如此。換而言之，自我形象目標雖同時具有促進和預防目標的可能，但是只要是在自我形象目標的框架下，依舊對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而較不會受到是否為預防或促進焦點的框架所混淆。關愛目標也是同時有趨近或迴避的成分，但只要是在關愛目標的框架下，便是對心理健康有正面的影響。

三、人際目標與自我調節

然而，人際目標的相關研究較少探討面對負向經驗時的效果，即個體對於負向經驗的自我調節，但這部分可從自我形象與關愛目標的特性予以推論。首先，持有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因為個體在建構理想的自我形象時，同時也會擔心他人發現自己與理想形象不符的行為，因而產生較高的焦慮情緒 (Crocker, 2008; Crocker & Canevello, 2012)。不僅如此，理想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差距，也會使個體導致與自我有關的負向情緒，例如羞恥與罪惡感，而此負向情緒即會干擾個體自我調節，進而影響從挫折經驗中學習的可能。相對的，持有關愛目標的個體在面臨挫折時，由於其焦點不在自身的得失，因而不會有過度的情緒激發，所以較能避免情緒性的干擾，而能坦然地面對挫折。本文根據此想法，認為持有關愛目標的個體，較不會因為面臨挫折而引發負面情緒，進而轉換為正向的進步態度。

過去研究發現個體回憶挫折時，若對自己產生嚴厲的批判，例如覺得自己無用或沒有價值，即為不良的自我調節，且對於心理適應跟任務目標達成有負面的影響 (Blatt & Zuroff, 1992)。然而，後續針對自我批評的研究則顯示，自我批評並非絕對帶來負向的影響，Bergner (1995) 便提出自我批評有兩個成分，一個是在失敗之後對自己產生負向感受的強度，有可能導致無助感，稱為情緒性自我批評 (emotional self-criticism)。另一則是在失敗之後，個體仍能自我進步的能力，稱為建設性自我批評 (constructive self-criticism)。由

此對應到人際目標來看，持有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由於需要不斷地建構或維持他人對自我的正面形象，且由自我形象目標與自我意識呈現正相關的結果來看（Crocker & Canevello, 2008），個體會對於社會比較的線索較敏感，進而讓個體更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相對的，採取關愛目標的個體則認為自我與他人之間是互相影響的，能同時把自我及他人的需求納入考量，所以對自我的看法較不會受到挫折事件而有所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預期採取關愛目標的個體，對於情緒性自我批評應沒有關聯，但可以有效預測建設性自我批評；自我形象目標則反之，即對建設性自我批評沒有影響，但可以有效預測情緒性自我批評。

四、小結與研究假設

整體而言，由人際目標的相關研究可知，個體從對自我形象的追求，轉入對他人福祉的關注，進而提升身心適應的想法和研究，在國內或華人社群中並沒有特別強調，針對此一研究缺口，本研究首先探討該量表對華人樣本的心理適應預測力。據此，在研究一的部分，先以三個獨立樣本（研究 1A 至研究 1C），分別檢驗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首先，研究 1A 先是翻譯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以了解其內部結構，再針對人際目標與心理適應指標的關聯性進行分析。我們預期該量表應與過去研究所得結果相同，為二因素結構；其中關愛目標與正向適應指標為正相關、與負向適應指標為負相關；由於在以往研究發現自我形象目標對於心理適應的關聯較不穩定（Crocker & Canevello, 2012），大致的結果是對正向適應指標為負相關或無相關、對負向適應指標為正相關或無相關，故本研究亦僅作與上述相同方向性的預測。研究 1B 再以不同樣本進行再測信度的檢驗，以確定量表的跨時間穩定性。研究 1C 則探討人際目標與相依自我和獨立自我之異同，我們預期在控制相依自我與獨立自我，人際目標亦能對心理適應具有預測力。然後於除此之外，在研究一的分析上，為考量個體的關愛目標有可能是達成自我形象目標的鞏固，像是藉由關懷他人來獲得好的聲望，Crocker 與 Canevello（2012）建議同時將兩個目標一起放入迴歸分析，以彼此控制，了解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的獨特人際預測力，本文也都以此進行分析，以控制住兩者間的相關影響。最後，研究 2 則應用至個體自我調節，預測在挫折情境時，關愛目標可預測個體的建設性自我批評，而自我形象目標則是預測個體的情緒性自我批評。整體而言，本研究係從量表之因素結構與效標效度，然後到時間穩定性之探討，進而至自我調節之應用，以完整地捕捉該量表的心理計量特性。

貳、研究1A

一、研究步驟、對象與工具

研究 1A 的目的為確認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的因素結構與對心理適應指標的預測力。在研究者獲得量表原作者 (Jennifer Crocker) 的中文翻譯同意後，再由兩位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兩位心理學博士班研究生、一位心理學碩士班研究生、與一位中英雙語 (bilingualism) 且獲得心理學碩士學位之專家，針對人際目標量表共 13 題進行翻譯與回譯。於獲得上述專家人士的共識後，確認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再施測於北部某大學修習普通心理學課程的學生，共 207 名研究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20.55 歲 (全距為 18 至 29 歲)，49% 為女性。研究參與者應課程要求參與本研究，並獲得實驗時數，除了施測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之外，在心理適應的部分則測量普遍使用的生活滿意度 (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正向與負向情緒量表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與心理憂鬱量表 (Radloff, 1977)。此外，研究者也同時測量個體的自尊與社會期許，乃因此二者在以往研究顯示對於心理適應皆有所影響，且有可能會影響個體的答題偏好，是故以量表預測心理適應時，宜予以控制以降低影響。以下為施測量表的相關說明。

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本中文版量表翻譯自 Crocker 與 Canevello (2008) 所編製之量表，共 13 題。主要是評量個體在自我形象目標 (6 題) 與關愛目標 (7 題) 的程度，為五點的李克特氏量表，1 分表示「從未如此」，5 分表示「總是如此」，分數愈高表示該人際目標的傾向愈高。該量表主要是針對人際情境中所用，故在填寫量表時，會讓研究參與者針對其與同學或朋友的互動方式來填答，係以「過去一週內，與朋友 / 同學相處時」為開頭，所有題項如表一所示。

生活滿意度量表：本量表為 Wu 與 Yao (2006) 翻譯自 Diener、Emmons、Larsen 及 Griffin (1985) 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共五題，測量整體生活滿意程度。Wu 與 Yao (2006) 以台灣大學生為樣本，發現在因素結構上具有跨性別的因素不變性 (factor invariance)。以往研究也指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計量特性，和其他主觀幸福感 (如正負向情緒、自尊等) 也具有有良好的輻合效度，為生活滿意度測量所廣泛使用的施測工具之一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本量表在不同文化下均有良好的預測力，如對正向情緒、人際互動、工作表現均呈現正相關，而對負向情緒、敵意、神經質傾向呈現負相關 (Diener, 2000;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本量表計分採李特克氏五點量表，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分表示「非常同意」，全部為正向題，分

數愈高表示對整體生活感受愈好。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 為 .88。

表一 研究1A人際目標量表各題之因素負荷量與描述統計 (N = 207)

題號	量表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因素二
11.	支持與鼓勵對方	3.84 (0.78)	.91	-.17
12.	設法讓他們的生活更美好	3.32 (0.96)	.72	-.15
5.	同理當他們遭遇困難或挫折時的痛苦	3.69 (0.77)	.66	-.05
10.	避免做出傷害到別人的事情	3.77 (0.99)	.46	.16
4.	避免自私或自我中心	3.86 (0.78)	.44	.07
1.	避免做出無益於自己或他人的事情	3.64 (0.98)	.33	.12
8.	提出對別人有建設性的建議	3.77 (0.78)	.32	.11
9.	避免讓他人看到我的缺點	3.67 (0.87)	-.15	.72
2.	避免讓自己有做錯事的機會	4.11 (0.66)	.01	.63
3.	讓他們對我留下好印象	3.98 (0.76)	.27	.57
7.	避免冒險或犯錯	3.96 (0.82)	.22	.51
13.	說服別人認可我的意見	3.47 (0.93)	-.14	.41
6.	避免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4.25 (0.70)	.17	.39
Cronbach's α			.76	.74
解釋變異量 %			27.29	10.19

正負向情緒量表：本量表為 Watson、Clark 與 Tellegen (1988) 所發展的量表，共有兩個分量表，分別為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各包含十個情緒詞，用以測量一段特定時間中，個人的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穩定狀態。本量表填答方式採李克氏五點量尺進行評量，正向情感平均分數越高，表示越常感受到正向情緒；負向情緒亦依此類推。相較於生活滿意度測量認知層次 (cognitive level) 的幸福感，正、負向情緒則為最普及測量情緒層次的幸福感指標，且亦在跨文化研究中獲得支持 (Diener, et al., 2003)。本研究在正向及負向情緒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6 和 .88。

心理憂鬱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CES-D 由 Radloff (1977) 所發展，中文版由 Chien 與 Cheng (1985) 翻譯。原始量表共包含 20 種身心的徵兆，量表之作答方式係詢問受訪者於過去一星期內，是否具有特定的憂鬱症狀，採李克氏四點計分，0 分代表沒有或極少 (每週一天以下)；1 分代表有時候 (每週一至二天)；2 分代表時常 (每週三至四天)；3 分代表經常 (每週 5 至 7 天)，分數愈高代表愈憂鬱。Chien 與 Cheng (1985) 以 16 分作為篩檢憂鬱症的切割點，應用此量表於區辨社區病人及非病人，量表的敏感度、特異性及誤失率分別為 92.0%、91.0%、8.2%，顯示

其良好的區辨力。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 為 .86。

臺灣社會讚許量表精簡版：為了避免人際目標量表與心理適應之關聯係受社會讚許的影響，研究者同時測量社會讚許程度作為淨相關之控制變項。本量表由廖玲燕（2004）編製，測量個體之自我欺瞞與印象粉飾傾向。原始量表包含 40 題，為考量研究參與者之填答負擔，本研究僅採用 10 題之精簡版，其中正向題與負向題各佔 5 題。正向題如「我總是以客觀的立場看待事情」；負向題如「有時我會在背後批評別人」。研究參與者在七點量表上進行各項敘述之同意度評估，在負向題反向計分後，本研究合併兩分量表進行總平均作為社會讚許程度之得分。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 為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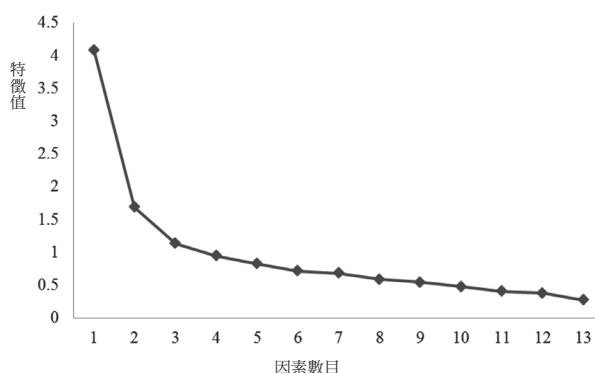
自尊量表：由於自尊為穩定預測心理適應的指標之一（Kernis, 2006），為了解人際目標能否在控制自尊後仍有其預測力，研究 1A 也測量自尊作為控制變項。不僅如此，放入自尊量表做為控制，也可降低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響。這代表可據此檢測以人際目標預測心理適應，並非單純地將好的自我感覺（例如自尊）和好的結果（心理適應）求取相關而已，而是關愛目標的概念特性本身便能獨特地預測整體的心理幸福感。本研究採用 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共 10 題，是一份對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的單向度測量，跨文化研究中顯示自尊對於幸福感有穩定的預測力（Diener et al., 2003）。中文量表由蔡芬芳（1997）所翻譯，採李克氏五點量表，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 分代表非常同意，將反向題反向計分後相加成總分，分數越高表示自尊越高。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 為 .84。

二、結果

首先，針對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 KMO 指標為 .81，顯示此量表項目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程序。研究者再以疊代主因子法（iterate principal factor method）粹取因素。由於在概念上與以往的實徵研究均顯示，自我形象目標與關愛目標並非互斥獨立的因素（Crocker & Canevello, 2008），因此採用最優斜交轉軸（promax）。結果顯示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的因素共有三個（其值依序為 3.54、1.32、1.04），但近期心理計量研究顯示特徵值大於 1 作為判定因素數目的方式有其不穩定性，且通常有高估因素數目的趨勢，是以建議陡坡圖（screen plot）的方式為佳（Henson & Roberts, 2006; Norris & Lecavalier, 2010）。故就本研究來看，第二因素的特徵值至第三因素後有明顯的下滑，而後趨於平緩，如圖一所示，故取兩個因素，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7.29% 與 10.19%。

整體而言，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與 Crocker 和 Canevello（2008）所得雷同，第一個

因素為關愛目標，第二個因素為自我形象目標，因素負荷量與描述統計如表一所示。因素分析顯示，屬於該因素下的題目，其負荷量均高於 .3；而與另一因素負荷量的差異均高於 .2，顯示題目在不同因素間的區辨性。另外，兩因素呈現正相關 ($r = .45, p < .001$)，也與以往研究雷同，即自我形象目標與關愛目標皆為人際目標下之構念，又或是個體可能會藉由關愛行為來彰顯自我形象目標 (Canevello & Crocker, 2010; Crocker, 2011; Crocker & Canevello, 2008)。



圖一 研究1A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因素分析陡坡圖

研究 1A 進一步探討人際目標與心理適應之預測力，分別以生活滿意度、心理憂鬱、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為依變項，在第一階段放入性別、年齡、自尊與社會期許，以進行統計控制；然後，在第二階段放入自我形象目標與關愛目標，以控制住彼此，了解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的獨特預測力。研究 1A 變項之描述統計如表二所示，階層迴歸分析如表三所示。

首先，由於預測變項之前有所相關，為了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影響，是以進行容忍值和變異數膨脹因子 (VIF) 的分析，結果發現容忍值介於 .69 至 .95，均符合大於 .1 的期待；VIF 則介於 1.06 至 1.46，均符合小於 10 的期待 (Cohen, Cohen, West, & Aiken, 2003)。之後多元迴歸分析發現，在控制個人背景變項、自尊與社會期許後，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的加入，對於模型解釋的增加均顯著 ($\Delta R^2 = .03 \sim .05, p < .05$)。細部分析顯示，在控制住控制變項與自我形象目標後，關愛目標依舊能有效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ps < .05$)，表示關愛目標的傾向愈高，愈能提升生活滿意度 ($\beta = .18, p < .01$) 與正向情緒 ($\beta = .18, p < .01$)，且愈能降低心理憂鬱 ($\beta = -.24, p < .01$) 與負向情緒 ($\beta = -.15, p < .05$)。自我形象目標無法預測正向心理適應指標 ($p > .1$)，但卻可以預測心理憂鬱 ($\beta = .16, p < .05$) 和負向情緒 ($\beta = .24, p < .01$)，即愈高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愈會有憂鬱傾向與負向情緒。

表二 研究1A各量表之描述統計與簡單相關 ($N = 207$)

	1.	2.	3.	4.	5.	6.	7.	8.
1. 關愛目標	.76							
2. 自我形象目標	.45**	.74						
3. 自尊	.07	.13	.84					
4. 社會讚許	.30**	.07	.25**	.80				
5. 生活滿意度	.21**	.07	.50**	.12	.88			
6. 正向情緒	.20**	.08	.34**	.16*	.30**	.86		
7. 負向情緒	-.18*	.13	-.38**	-.37**	-.34**	-.43**	.88	
8. CES-D心理憂鬱	-.25**	.11	-.56**	-.24**	-.47**	-.39**	-.43**	.86
平均數	3.70	3.89	3.38	3.92	4.44	3.34	2.80	1.86
標準差	0.54	0.52	0.53	0.62	1.07	0.56	0.60	0.42

* $p < .05$, ** $p < .01$

註：對角線為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整體而言，研究 1A 顯示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具有二因素結構，且關愛目標與正向心理適應指標呈現正相關，而與負向心理適應指標呈現負相關；自我形象目標則主要預測個體的負向心理適應指標，重複驗證了以往發現¹ (Crocker et al., 2010)。

表三 研究1A各心理適應指標之多元迴歸分析 ($N = 207$)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CES-D心理憂鬱		容忍值	VIF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性別	-.07	-.04	-.08	.12	-.02	-.02	.01	-.04	.91	1.10
年齡	-.12	-.11	-.06	-.05	-.01	.01	.04	.04	.95	1.06
自尊	.47**	.45**	.31**	.31**	-.29**	-.32**	-.51**	-.53**	.89	1.12
社會期許	.05	.01	.08	.03	-.29**	-.27**	-.12	-.05	.81	1.23
關愛目標		.18**		.18*		-.15*		-.24**	.69	1.46
自我形象目標		-.09		-.05		.24**		.16*	.76	1.32
Adj R^2	.24**	.28**	.11**	.14**	.20**	.25**	.29**	.34**		
Δ Adj R^2		.04**		.03*		.05**		.05**		
F	15.92**	11.57**	7.72**	5.44**	13.10**	11.05**	21.24**	16.50**		

* $p < .05$, ** $p < .01$

¹ 若比照 Crocker 等人 (2010) 的作法在本研究中將關愛和自我形象目標再細分出趨近與迴避向度，結果重複驗證 Crocker 等人 (2010) 的發現，亦即，依舊只發現關愛和自我形象目標的效果，而沒有受到趨近和迴避的影響。像是自我形象趨近目標 (例題：說服別人認可我的意見)，在多元迴歸對負向情緒之預測依舊顯著 ($\beta = .20, p < .05$)，自我形象迴避目標 (例題如：避免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也如此 ($\beta = .24, p < .05$)，兩者之方向和效果雷同，都是愈高有愈多負向情緒。同理，關愛趨近與迴避目標所得的結果亦是一致。

參、研究1B

一、研究步驟、對象與工具

研究一 B 為確定量表之再測信度，我們以北部某大學修習普通心理學課程的 54 名學生，平均年齡為 20.89 歲（全距為 18 至 27 歲），49% 為女性，以獲得實驗時數為酬謝，相隔兩週施測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

二、結果

研究一 B 發現關愛目標的兩週再測信度為正相關 ($r = .68, p < .001$)，自我形象目標的兩週再測信度為正相關 ($r = .66, p < .001$)。此外，我們再分別針對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在兩週內的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 ($t < 1.47, p > .10$)，即研究參與者之再測信度穩定，並未隨時間而有顯著變化。

肆、研究1C

一、研究步驟、對象與工具

研究 1C 係針對人際目標與獨立自我和相依自我構念的差異，即預期在控制住自我構念後，人際目標依舊能預測心理適應。我們以北部某大學修習普通心理學課程的 82 名學生，平均年齡為 20.87 歲（全距為 18 至 25 歲），39% 為女性，以獲得實驗時數為酬謝，分別施測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心理憂鬱量表、正向與負向情緒量表，其量表內容皆同研究 1A。此外，我們再施測 Lu 與 Gilmour (2006) 的獨立我與相依我量表，各為 9 題，共 18 題。該量表經過嚴謹的因素分析檢驗，且廣泛使用於華人社群的研究中。相依我的題項如：「我認為家庭的榮辱攸關我的自我認同」、「我認為保持團體和諧很重要」。獨立我的題項如：「我相信人應該有自己的理想，並努力實現」、「我相信與人相處應該直接了當」。研究 1C 變項之描述統計、相關與信度如表四所示。



表四 研究1C各量表之描述統計與簡單相關 ($N = 82$)

	1.	2.	3.	4.	5.	6.	7.	8.
1.關愛目標	.82							
2.自我形象目標	.52**	.88						
3.獨立我	.14	.17	.84					
4.相依我	.32**	.12	.27*	.81				
5.生活滿意度	.35**	.13	.14	.06	.84			
6.正向情緒	.43**	.15	.38**	.35**	.56**	.81		
7.負向情緒	-.26*	.01	.05	-.18	.40**	-.39**	.88	
8.CES-D心理憂鬱	-.31**	-.10	-.07	-.18	.68**	-.63**	.74**	.85
平均數	3.84	3.51	3.88	3.83	4.31	3.35	3.18	1.93
標準差	0.57	0.65	0.45	0.48	1.33	0.55	0.83	0.59

* $p < .05$, ** $p < .01$

註:對角線為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二、結果

分析步驟如同研究 1A，分別以生活滿意度、心理憂鬱、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為依變項，在第一階段放入性別、年齡、相依我與獨立我，以進行統計控制；然後，在第二階段放入自我形象目標與關愛目標，如表五所示。

表五 研究1C各心理適應指標之多元迴歸分析 ($N = 82$)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CES-D心理憂鬱		容忍值	VIF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性別	-.15	-.16	-.03	-.05	-.09	-.09	.07	.08	.98	1.02
年齡	-.06	.06	-.01	.08	.03	-.10	.01	-.11	.80	1.26
相依我	.13	-.01	.26*	.20	-.20	-.16	-.02	.10	.79	1.26
獨立我	.11	-.06	.31**	.21*	.11	.15	-.16	-.11	.84	1.19
關愛目標		.38**		.28*		-.46**		-.39**	.60	1.77
自我形象目標		.07		.06		.23*		.06	.71	1.40
Adj R^2	.04	.16*	.17*	.23*	.01	.10*	.04	.17*		
Δ Adj R^2		.12*		.06*		.09*		.13*		
F	.90	2.60*	5.43**	5.09***	1.17	2.53*	.70	2.8 *		

* $p < .05$, ** $p < .01$, *** $p < .001$

如同研究 1A 般，為了避免預測變項的多元共線性影響，是以進行容忍值和變異數膨脹因子 (VIF) 的分析，結果發現容忍值介於 .60 至 .98，均符合大於 .1 的期待；VIF 則介於 1.02 至 1.77，均符合小於 10 的期待。之後，多元迴歸分析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項、獨立我與相依我後，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的加入，對於模型解釋的增加均顯著 ($\Delta R^2 = .06 \sim .13, p < .05$)。細部分析顯示，控制住其他變項之後，關愛目標依舊能有效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p < .05$)，表示關愛目標的傾向愈高，愈能提升生活滿意度 ($\beta = .38, p < .01$) 與正向情緒 ($\beta = .28, p < .01$)，且愈能降低心理憂鬱 ($\beta = -.46, p < .01$) 與負向情緒 ($\beta = -.39, p < .05$)。自我形象目標的結果則類似研究 1A，雖然無法預測正向心理適應指標 ($p > .1$)，但卻可以預測負向情緒 ($\beta = .23, p < .05$)，即愈高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愈會有負向情緒。

此外，在本研究中，人際目標與自我構念呈現不顯著的零相關至輕度正相關 ($r = .14 \sim .32, p = .01 \sim .20$)，即顯示這兩者的不同。其中，最大相關在關愛目標和相依我 ($r = .32, p < .01$)，其餘相關均不顯著 ($p > .10$)。然而，若再進行淨相關分析，控制住年齡、性別、自我形象目標與獨立我之後，關愛目標與相依我之相關則下降至不顯著 ($r = .16, p = .16$)。這樣的結果顯示出關愛目標與相依我雖然都包含關注他人的成分，但關愛目標可能更加入了幫助別人的動機，而不是只有聚焦於他人，是故兩者仍然有其不同之處。據此，研究 1C 不僅區辨人際目標與自我構念之差異，也顯示即便控制住自我構念，人際目標對心理適應依舊有其穩定的預測力，也呼應近期 Niiya 等人 (2013) 的研究結果。

伍、研究2

最後，研究 2 則進行人際目標理論的延伸，即是將人際目標量表應用至個體真實面對挫折情境時的回應方式，以理解該量表在自我調節上的特色。我們預測當個體面臨挫折情境時，關愛目標能引發正向的建設性自我批評，而自我形象目標則引發負向情緒性自我批評。

一、研究對象、工具與步驟

本研究之受試者為北部某大學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共 76 名，70% 為女性，年齡全距 18-24 歲。相關施測工具如下：

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同研究 1A。本研究在關愛目標及自我形象目標所得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63 和 .70。

情緒性與建設性自我批評量表：該量表係參考 Ossorio (1990) 與廖文慈 (1997) 進行編製，共 16 題，其中情緒性自我批評量表共 9 題（例題如：當我覺得我並未努力發揮潛能時，我很難原諒自己；當我發覺狀況並非我所能操控時，我會很難受。）；建設性自我批評共 7 題（例題如：即使他人還沒給我回饋，我已清楚知道可以如何改進；每次的檢討對我以後做報告很有幫助。）。量表使用李克氏六點量尺進行評量，1 分表示極少符合，6 分表示完全符合，平均分數越高，表示個體情緒性和建設性自我批評傾向越高。經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在所屬因素下皆超過 .30 的因素負荷量，且與另一因素之區辨負荷量皆大於 .20。信度方面，建設性自我批評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 .72，情緒性自我批評量表則是 .79。

在研究程序上，首先由研究參與者填寫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問卷，然後回憶在該門課的課堂小組報告上，自己沒有做好的地方，並將具體細節寫出，相關指導語為：「請描述準備本課程研究報告過程中，『自己』沒有做好的地方，例如資料搜集、問卷設計、施測、資料分析整理、口頭報告或撰寫書面報告等（至少三個）」，但若研究參與者覺得沒有，也可以回覆沒有，而在本研究中的參與者均有回覆其具體挫折。最後，再針對此一事件，填寫建設性與情緒性自我批評量表。

二、結果

研究四欲探討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對兩種自我批評之影響，分析步驟如同研究 1A 與研究 1C，即是分別將情緒性與建設性自我批評作為依變項，在迴歸中第一階段放入性別與年齡，第二階段則是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研究 2 變項之描述統計如表六所示，階層迴歸分析如表七所示。

表六 研究二各量表之描述統計與簡單相關 ($N = 76$)

	1.	2.	3.	4.
1.關愛目標	.63			
2.自我形象目標	.60**	.70		
3.情緒性自我批評	.03	.41**	.72	
4.建設性自我批評	.52**	.27*	.21	.79
平均數	3.89	3.77	4.10	5.20
標準差	0.44	0.48	0.90	0.64

* $p < .05$, ** $p < .01$

註：對角線為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首先，為了避免預測變項的多元共線性影響，是以進行容忍值和變異數膨脹因子 (VIF) 的分析，結果發現容忍值介於 .62 至 .97，均符合大於 .1 的期待；VIF 則介於 1.04 至 1.61，均符合小於 10 的期待。之後，多元迴歸分析發現關愛目標能正向預測建設性自我批評 ($\beta = .42, p < .01$)，而對情緒性自我批評則不顯著。相對的，自我形象目標能正向預測情緒性自我批評 ($\beta = .41, p < .01$)，對建設性自我批評則無顯著預測力。整體而言，研究四顯示持有關愛目標的個體，在面臨負向挫折時，較常使用建設性自我批評，即是引發正向的自我成長信念；同時發現持有自我形象目標的個體，較常採用情緒性自我批評，即是在面對負向事件時，個體容易批判自我，且對自我看法變得負面。

表七 人際目標對情緒性及建設性自我批評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N = 76$)

	情緒性自我批評		建設性自我批評		容忍值	VIF
	Step 1	Step 2	Step 1	Step 2		
性別	-.01	-.07	.08	.07	.97	1.04
年齡	-.06	-.07	.11	.08	.95	1.06
關愛目標		-.24		.42**	.63	1.58
自我形象目標		.41**		.14	.62	1.61
Adj R^2	.01	.08*	.03	.25**		
Δ Adj R^2		.07*		.22**		
F	.09	4.10*	1.12	7.40***		

* $p < .05$, ** $p < .01$, *** $p < .001$

陸、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確立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在華人研究參與者之信效度，與其和自我調節的關聯。結果顯示人際目標量表包括關愛目標及自我形象目標兩因素，且內部一致性在可接受範圍內 (研究 1A)，有穩定的再測信度 (研究 1B)，此量表對相關心理適應指標也具有良好預測力 (研究 1A 與研究 1C)。研究 2 則發現在自我調節方面，關愛目標與建設性自我批評有正向預測力，而自我形象目標則是與情緒性自我批評有正向預測力，此結果與 Crocker、Moeller 和 Burson (2010) 的觀點相呼應，當個體把驗證自我價值目標轉移成對自己與他人都有益的目標，自我與他人的連結感讓個體產生提升及改進自己的動機，加上未過度引發情緒，因而讓個體更能坦然面對挫折。綜括上述結果，本研究顯示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且能有效預測個體面對挫折的調節方式。以下將針對

本研究的結果進行討論，並討論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之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可能。

一、人際目標與心理適應之關聯

在研究 1A 與研究 1C 中發現，自我形象目標與心理適應預測力較不一致，主要顯示自我形象目標較能穩定預測負向心理適應指標（如 CES-D 憂鬱量表、負向情緒），但與正向心理適應指標（如生活滿意度、正向情緒）的關聯則較不穩定；然而在研究 2 裡，自我形象目標對於不良心理適應（情緒性自我批評）則有較為穩定的預測力。針對這樣的現象，可能有兩個調節的可能解釋。首先，就研究 2 的結果來看，當個體在面臨挫折情境時，自我形象目標對於不良的情緒性自我批評預測力相對高（ $\beta = .41, p < .01$ ），這可能展示出在面對挫折情境時，自我形象目標的效果予以突顯而出，這也呼應近期對於自我威脅（ego threat）的相關研究發現（Leary, Terry, Allen, & Tate, 2009），是以個體在面臨對於自我形象的威脅時，更會顯示出相關情緒反應與防衛機制。而就研究 1A 以及 1C 來看，只以橫切時間面進行測量，而且是在一種相對中性情境的狀態下，是以自我形象的效果則較無法有效呈現。另一個調節可能，則從短期（short term）和長期（long term）時間面向的角度切入，就從短期來看，個體確實可能因藉由滿足自我形象目標，立即提升正向情緒；但由於其滿足的程度必須倚賴外在情境的條件，若拉長時間來看，有時能滿足、有時則無法滿足自我形象的彰顯，此波盪性在一個橫斷面上對於正向心理適應指標並不見得會有明顯的關連，然而其內在持續性的焦慮則會對負向心理適應指標有直接的影響。除此之外，相對於在動機層次追逐自尊的自我形象目標，研究一結果顯示特質層次的自尊穩定地預測心理適應指標，而且特質自尊和自我形象目標也未達顯著，這突顯出在特質與動機上的差異，呼應了 Crocker 與 Park（2004）討論到追求自尊的弔詭，即特質自尊確實對於心理適應有所助益，但在現今強調追捧自我價值和過份自我彰顯的社會氛圍中，則會讓個體產生熱衷追求自尊的動機。雖然這樣的動機也許能帶來短期的正向感受，但對於長期的心理健康則是有所危害，主要原因是在於當過度地在意自我形象時，此在意一來產生評價焦慮，二來若是不符合心中期待，又會產生挫折與失落，進而造成如前言所述的條件化自我價值，處於波動而不穩定的狀態中。因此，為了確定自我形象目標對於正向心理適應的影響，我們也可於未來研究進行長期資料的追蹤，以更完整地瞭解自我形象目標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雖然本研究顯示中文版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具有不錯的信效度，但仍有些許研究

限制，可於未來研究補足。首先，本研究所有參與者皆為大學生，因此在推論上可能仍有限制，未來研究若能收集其它的樣本群，例如成人或青少年樣本，則能增加關愛與自我形象目標量表的適用性與推論性。這部分突顯出本研究較聚焦於同儕等水平關係，是在未來研究中，可嘗試延伸至較為垂直關係層次，例如家長、教師等，甚而了解關愛目標與自我形象目標在不同關係層次中的轉變，以利人際目標能與華人關係主義有更多連結 (Hwang, 2011)，進而從文化、自我、與動機層次間的交互作用有更細膩的理解。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皆在同一時間點收集，因此無法驗證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加上個體採用的人際目標程度可能會隨著時間變動，後續研究若能以重覆測量設計實驗，應更能捕捉長期人際目標對個體的實際影響。另一方面，在研究 2 實驗操弄中，係提供實驗時數支酬賞，故有可能受到要求特徵之影響，是在未來研究中，亦可加入控制組的方式平衡之，以更精確地探討實驗效果。在方法學層次上，Crocker 與其同事使用對偶樣本的研究設計，為人際目標研究增添了豐富性，且讓人際層次的構念能更廣泛地應用到實際的人際互動情境 (Reis, Collins, & Berscheid, 2000)。然而，目前人際目標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對偶樣本的雙向路徑，未來研究可以提升到團體層次，以考量在團體動力中，個體的人際目標對整個團體與個人的多向影響。最後，在理論層次上，關於自我建構（例如相依自我與獨立自我）、人際目標和自我調節之關聯，也可嘗試於未來研究中進行較為完整的測量，以了解相關構念知更深層的內在機制。

參考文獻

- 蔡芬芳 (1997): 自尊對自利歸因的影響：自我概念內容與架構的交互作用。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Tsai, F. F. (1997). *Self-esteem and self-serving attribu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self-concept*.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廖文慈 (1997): 依賴型、自我批評型憂鬱情緒與心理社會因素關係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Liao, W. C. (1997). *Psychoso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persons with dependent and self-critical depressive features*.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廖玲燕 (2004): 台灣本土社會讚許量表之編製及其心理歷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Liao, L. Y. (1997). *The new scale of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ding*

- in Taiwan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alysis*.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Bargh, J. A., Gollwitzer, P. M., & Oettingen, G. (2010). Motivation.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 ed., pp. 268-316). New York, NY: Wiley
-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M. (1996).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1), 5-33. doi: 10.1037/0033-295X.103.1.5
- Bergner, R. (1995). *Pathological self-criticism: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 Blatt, S., & Zuroff, D. (1992).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self-definition: Two prototypes for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2*, 527-562. doi:10.1016/0272-7358(92)90070-O
- Canevello, A., & Crocker, J. (2010). Creating good relationships: Responsivenes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1), 78-106. doi: 10.1037/a0018186
- Chen, S., Boucher, H. C., & Tapias, M. P. (2006). The relational self revealed: Integrative conceptu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lif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151-179. doi: 10.1037/0033-2909.132.2.151
- Chien, C. P., & Cheng, T. A. (1985). Depression in Taiw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utilizing CES-D. *Psychiatria at Neurologia Japonica*, *87*(5), 335-338.
- 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 Aiken, L. S. (200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 Hillsdale, NJ: Erlbaum.
- Crocker, J. (2008). From egosystem to ecosystem: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In H. Wayment & J. Brauer (Eds.), *Transcending self-interest: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s of the quiet ego* (pp. 63-7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Crocker, J. (2011). Self-image and compassionate goal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lf: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4), 394-407. doi: 10.1177/1088868311418746
- Crocker, J., Brook, A. T., Niiya, Y., & Villacorta, M. (2006). The pursuit of self-esteem: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nd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6), 1749-1771. doi: 10.1111/j.1467-6494.2006.00427.x
- Crocker, J., & Canevello, A. (2008). Creating and undermining social support in communal relationships:

- The role of compassionate and self-image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3), 555-575. doi: 10.1037/0022-3514.95.3.555
- Crocker, J., & Canevello, A. (2012). Consequences of self-image and compassionate goals. In P. G. Devine & A. Plant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5, pp. 229-277). New York, NY: Elsevier.
- Crocker, J., Canevello, A., Breines, J. G., & Flynn, H. (2010). Interpersonal goals and change in anxiety and dysphoria in first-semester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6), 1009-1024. doi: 10.1037/a0019400
- Crocker, J., & Luhtanen, R. K. (2003). Level of self-esteem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Unique effects on academic, social, and financial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6), 701-712. doi: 10.1177/0146167203029006003
- Crocker, J., Moeller, S., & Burson, A. (2010).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 Implications for self-regulation. In R. Hoyle (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elf-Regulation* (pp. 403-429). New York, NY: Wiley-Blackwell.
- Crocker, J., & Park, L. E. (2004).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3), 392-414. doi: 10.1037/0033-2909.130.3.392
- Crocker, J., & Wolfe, C. T. (2001).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3), 593-623. doi: 10.1037//0033-295x.108.3.593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43. doi: 10.1037/0003-066X.55.1.34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doi: 10.1207/s15327752jpa4901_13
- Diener, E., Oishi, S., & Lucas, R. E. (2003). Personality,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403-425. doi: 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56
-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 Smith, H. 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76-302. doi: 10.1037//0033-2909.125.2.276
- Dunn, E. W., Aknin, L. B., & Norton, M. I. (2008). Spending money on others promotes happiness. *Science*, 319, 1687-1688. doi: 10.1126/science.1150952
- Dweck, C. S. (1986). Motivational processes affecting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10), 1040-1048. doi: 10.1037/0003-066X.41.10.1040

- Henson, R. K., & Roberts, J. K. (2006). Use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published research: Common errors and some comment on improved practic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6*(3), 393-416. doi: 10.1177/0013164405282485
- Hwang, K. K. (2011).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 Kernis, M. H. (Ed.). (2006). *Self-esteem issues and answers*.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 Leary, M. R., Terry, M. L., Allen, A. B., & Tate, E. B. (2009). The concept of ego threat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Is ego threat a viable scientific constru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3*(3), 151-164. doi: 10.1177/1088868309342595
- Leonardelli, G. J., Pickett, C. L., & Brewer, M. B. (2010).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 A framework for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gnition,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M. P. Zanna & J. M. Olson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3, pp. 63-113). San Diego, CA: Elsevier.
- Lu, L., & Gilmour, R. (2006).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ly oriented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scale developmen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1), 36-49. doi: 10.1111/j.1367-2223.2006.00183.x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doi: 10.1037/0033-295X.98.2.224
- Moeller, S. J., Crocker, J., & Bushman, B. J. (2009). Creating hostility and conflict: Effects of entitlement and self-image goa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2), 448-452. doi: 10.1016/j.jesp.2008.11.005
- Molden, D. C., & Dweck, C. S. (2006). Finding “meaning” in psychology - A lay theories approach to self-regulation,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3), 192-203. doi: 10.1037/0003-066X.61.3.192
- Niiya, Y., Crocker, J., & Mischkowski, D. (2013). Compassionate and self-image go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3), 389-405. doi: 10.1177/0022022112451053
- Norris, M., & Lecavalier, L. (2010). Evaluating the use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0*(1), 8-20. doi: 10.1007/s10803-009-0816-2
- Ossorio, P. (1990). *Appraisals: Advances in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n Arbor, MI: Descriptive Psychology Press.

- Radloff, L. S. (1977).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3), 385-401. doi: 10.1177/014662167700100306
- Reis, H. T., Collins, W. A., & Berscheid, E. (2000). The relationship context of human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6), 844-872. doi: 10.1037//0033-2909.126.6.844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sbult, C. E., & Van Lange, P. A. M. (2003).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351-375. doi: 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59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doi: 10.1037/0022-3514.54.6.1063
- Wu, C. H., & Yao, G. (2006). Analysis of factorial invariance across gender in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6), 1259-1268. doi: 10.1016/j.paid.2005.11.012

收件日期：104年01月04日

複審一日期：104年03月08日

複審二日期：104年04月12日

複審三日期：104年05月15日

通過日期：104年09月30日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mpassionate and Self-Image Goal Scal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lf-Regulation

Jen-Ho Chang	Hsuan-Hsu Lin	Chin-Lan Huang	Yi-Cheng L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rocker and Canevello (2008) proposed the self-image goal and compassionate goal as two basic interpersonal goals in human behavior. The self-image focuses on pursuing self-image, and the compassionate goal focuses on caring for and supporting others' need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se two interpersonal goals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distinctively. Thus, study 1A recruited 207 participants for testin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goal measure. Results indicated support for the same two-factor structure as in previous studies. In addition, the compassionate goal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ositively, and the self-image goal did not predic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r even negatively. Study 1B recruited 54 participants to examin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fter two weeks. Study 1C recruited 82 participant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personal goal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ontrolling for self-construal. Study 2 recruited 76 participants and asked them to recall frustrating event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mpassionate goal predicted constructive self-criticism, and the self-image goal predicted emotional self-criticis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Chinese version of compassionate and self image goal scale, compassionate goals, interpersonal goals, self image goals.



